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鵬程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七輯

龔鵬程 主編

第8冊

唐末五代諷刺詩研究（下）

黃致遠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末五代諷刺詩研究（下）／黃致遠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
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 99〕

目 2+196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七輯；第 8 冊）

ISBN 978-986-254-123-4（精裝）

1. 隋唐五代詩 2. 諷刺文學 3. 詩評

820.9104

99001783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七輯 第八冊

ISBN：978-986-254-123-4

唐末五代諷刺詩研究（下）

作 者 黃致遠

主 編 龔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 年 3 月

定 價 第七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唐末五代諷刺詩研究（下）

黃致遠 著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	8
一、時間斷限	8
二、內容範圍	9
三、研究材料	11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2
第四節 研究概況	14
第二章 唐末五代諷刺詩之時代背景	17
第一節 政治環境	18
一、宦官專權	18
二、朋黨傾軋	20
三、藩鎮割據	21
四、外患侵擾	22
第二節 經濟社會	24
一、中原賦稅趨苛重	24
二、經濟重心在江南	26
三、社會風氣趨墮落	27
第三節 詩壇概況	29
第三章 唐末五代諷刺詩溯源與義界	33
第一節 唐末五代諷刺詩溯源	34
一、《三百篇》美刺的理論	35
二、漢賦樂府詩的開展	37
三、新樂府諷諭的精神	39
第二節 唐末五代諷刺詩義界	42
第四章 唐末五代諷刺詩重要作家與作品	51
第一節 皮日休	53
第二節 陸龜蒙	65
第三節 羅隱	76
第四節 杜荀鶴	89
第五節 司空圖	103
第六節 鄭谷	117
第七節 吳融	132
第八節 韋莊	145

第九節 貫休	156
第十節 齊己	167
第十一節 其他詩人	167
下 冊	
第五章 唐末五代諷刺詩之主題取向	209
第一節 批判昏庸統治者	215
一、昏庸無能荒淫奢侈	217
二、不惜民力肆意剝削	221
三、對統治者要求責任	225
第二節 政治問題的反思	229
一、司法不公	230
二、吏治敗壞	232
三、用人不當	239
第三節 諷刺社會不公平	245
一、哀憐生民疾苦	246
二、批判豪門奢華	256
三、關注戰爭議題	259
四、抨擊趨炎附勢	269
第六章 唐末五代諷刺詩之藝術手法	273
第一節 諷刺手法之採行	274
一、含蓄的諷刺	276
二、直言的諷刺	289
第二節 表現技巧之運用	296
一、題材小中見大	297
二、議論以明題旨	303
三、對比強化諷刺	310
四、善用設問反語	318
五、示現激發共鳴	327
第七章 唐末五代諷刺詩之價值及影響	337
第一節 庶人議政，真實紀事	338
第二節 刺美時政，勸善懲惡	347
第三節 議論說理，開創詩風	355
第四節 白話入詩，俚俗淺近	365
第八章 結 論	375
參考書目	385

第五章 唐末五代諷刺詩之主題取向

清代文學家趙翼有這樣一句詩：「國家不幸詩家興」，這裏的「詩」，所指就是反映民生疾苦和作者強烈的批判態度之作品。諷刺詩伴隨著時代而興起。唐代諷刺詩和唐詩的鼎盛期並不一致，加之，中唐後期的元、白提出的諷諭理論，也促成了諷刺詩在唐末五代的興盛。

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認為文學起源於人類心靈與外物交感，人感受外在環境物態的刺激而產生情感，再形諸語文，發為文學。陸機〈文賦〉云：

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懷懷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註1〕

秋天見樹葉黃落而悲傷，春天見枝條嫩綠而喜悅；想到寒霜就心情肅然，面對雲霞就意志高遠，情感激動當然要感物吟志，透過文學加以宣洩。南朝劉勰《文心雕龍》有關「感物吟志」的意見，更是隨處可見：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詩）〔註2〕
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

〔註1〕 蕭統：《文選》，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1月第11版，頁245。

〔註2〕 劉勰：《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71年5月台9版，卷2，頁1。

雲而並驅矣。(神思)〔註3〕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物色）〔註4〕

自然環境變遷，予人情感盪漾，不能自已，為情而造文，激發藝術創作。所謂「緣景生情，發為吟詠」，於是有了文學作品的產生。生活週遭事物，與詩歌創作有著密切關係，鍾嶸《詩品·序》云：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註5〕

把「物」擴展到社會生活方面，說明文學創作的來源，是外界事物一股強大力量，它震撼人心而與人的性情相契合，將這份契合的感應，形諸於筆墨，文學作品因而誕生。

自然景物及客觀事物對於人類感情的微妙作用，都可以作為詩文創作之題材內容。因為作家之創作，多將其生活事件或生活現象提煉至作品中，因此一篇作品之完成，必表現一定之主題思想，而生活素材多成了作品之題材。

題材是作者將人物、器用、歷史、神話等社會素材，以及植物、動物、風霜等人文素材，就其人生經驗中所感知的，進行選擇、提煉、加工、改造之後，呈現於作品之中。洪順隆認為：

題材乃指作家用以表現作品主題思想之素材，也是文學作品中組織生活主題的單元，它具有決定文體的作用，更與文學體裁有不可分割之關係，題材不同，所表現的生活內

〔註3〕 同上註，卷6，頁1。

〔註4〕 劉勰：《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71年5月台9版，卷10，頁1。

〔註5〕 鍾嶸：《詩品》，台北：地球出版社，1994年，頁1～3。

容自然不同，體裁樣式亦相異。〔註6〕

透過題材，可以了解作者的心靈，作品感染力因而更為強烈。美國作家哈特在《諷刺論》進一步指出：

一般地說，諷刺的題材沒有特別規定。作家們過去創作諷刺，有的選取最重大的主題；有的則選取最瑣細的主題；有的選取最嚴肅的主題；有的則選取最淫蕩的主題；有的選取最聖潔的主題；有的則選取最卑污的主題；有的選取最有趣的主題；有的則選取最討厭的主題。諷刺家不能把握的主題極少極少。雖說如此，我們還必須說，諷刺偏愛的那類題材（或主題）總是具體的，總是時評式的，並且總是帶有人身攻擊色彩的。

以諷刺的寫作手法而言，其主題選擇是多元化的，且偏愛具體、有時代意義的，採取攻擊的方式呈現。

「主題」這個用語，約當於英語的「Theren」。在西方文學研究，「Theren」的含義與用法是相當分歧而沒有定論的。本文使用「主題」及其相關概念，乃以我們研究的問題為中心，並參考西方文學理論中「Theren」的相關意義。〔註7〕

日本人丸山學《文學研究法》對「主題」的看法是：

於文學的場合，把成為作者製作之出發點的原始的題目，稱為主題。主題原來是抽象的，富於彈性的一種觀念。他是一種胚芽似的東西，其自身渺小，視之漠然，但它卻是含著規定作品的將來的力量的主要種子。〔註8〕

主題指作者創作文學作品具體表現的根本意念，原本是抽象的概念，主題亦是文學作品的出發點，因此透過主題的分析，可以了解作者在

〔註6〕 洪順隆：〈六朝題材詩系統論〉，見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抽印本，南京：南京大學中文系，1995年11月。

〔註7〕 Werner Sollors：“Theme”as a Theme，收錄 Werner Sollors ed., The Return of Thematic Criticism，頁1~20。

〔註8〕 丸山學著；郭虛中譯：《文學研究法》，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頁144。

作品內所要表達的根本意思。因此依循作者所選取的題材，以及以何種方式處理這種題材的軌跡，是探求主題的途徑。

唐末五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黑暗的時期。無論政治、經濟、社會生活，還是思想、文學等方面，都呈現出一種不同於前期的風貌。時代特徵在決定文學的主題上，佔有極重的份量。法國著名學者丹納認為：

悲傷既是時代的特徵，他在事物中所看到的當然是悲傷。不但如此，藝術家原來就有誇張的本能與過度的幻想，可以他還擴大特徵，推之極端。特徵印在藝術家心上，藝術家又把特徵印在作品上，以致他所看到所描繪的事物，往往比當時別人所看到所描繪的色調更陰暗。〔註9〕

由於唐末五代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時期，余成教認為：「國體傷變，氣候改色，人多商聲，亦愁思之感。」〔註10〕於是便形成了唐末五代詩歌哀傷、絕望的基調。但是，唐代是詩歌發展的高峰期。初、盛時期文人的蓬勃與飛揚，中唐時期文人「中興」的熱情與希望，當歷史的軌跡邁入了唐末五代，文人的心理不自覺地產生了一股悲涼，他們感受到了唐帝國滅亡前的絲絲寒意，詩人們只能無奈地適應著眼前這個悲涼的社會。唐代王玄認為：「詩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時明則詠，時暗則刺之。」〔註11〕晚唐伊始，唐王朝已是滿目瘡痍、民不聊生；政局混亂，君主已少有勵精圖治的能力，並且更加窮奢極欲，使得社會矛盾更加激化。腐敗的政治局面與混亂的社會秩序，固然消泯了唐末文人拯時救國的政治熱情，但在自身或親歷亂離或逃避世事的人生遭遇中，則又不能不引起對國事人生的深重憂慮，因此，在唐

〔註9〕 丹納著；傅雷譯：《藝術哲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6～37。

〔註10〕 余成教：《石園詩話》見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第18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2月，頁239。

〔註11〕 趙永紀編：《古代詩話精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頁148。

末文人普遍的落寞心態中，實際上包含著深刻的憂患意識，在詩歌創作實踐中具體地呈現，影響面甚為廣泛。

唐末五代的衰世末年，生於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士人們紛紛創作詩歌來諷時刺世。此時諷刺詩的題材涉及社會生活等各層面，從上層的昏庸腐朽，到社會世道不公不正的醜惡現象，在詩人筆下具體地呈現。縱觀唐末五代的諷刺詩，痛心、憎惡、嘲笑的口吻始終瀰漫於其間，茲以羅隱、鄭谷為例，略加說明下：

《舊五代史·羅隱傳》云：「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所譏諷。」，〔註12〕《唐才子傳》亦云：「詩文凡以諷刺為主，雖荒祠木偶，莫能免者。」〔註13〕可知羅隱的詩歌以諷刺為主，而其詩歌題材，大多取自於現實社會、經濟、政治各層面，並經由其思想、人格以及詩觀的整體運作而形成。羅隱以詩作來反映民生疾苦、抨擊時政、譏諷當道，則其諷刺詩的主題傾向是顯而易見的。〔註14〕

另一詩人鄭谷，嚴壽激等人於《鄭谷詩集箋注》前言云：「黃巢起義後，唐末重大的政治軍事動亂，幾乎都能從鄭谷漂流江湖的一葉破舟中，直接或間接地得到反映」。〔註15〕這是極其高明而難能可貴的看法。劉秀芬認為：

占《雲台編》三分之一多的奔亡傷亂之作，客觀地記錄了唐末政權內部之爭，描繪了日趨激烈的各種社會矛盾，折射出當時社會的黑暗面貌，故稱之為唐末咸通以後的一部詩史並不過分。〔註16〕

〔註12〕 薛居正：《舊五代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1年6月，卷24，頁4。

〔註13〕 辛文房：《唐才子傳校箋》，傅璇琮主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5月，第4冊，卷9，頁123。

〔註14〕 黃致遠：《羅隱及其詩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12月，頁134。

〔註15〕 嚴壽激、黃明、趙昌平：《鄭谷詩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頁5。

〔註16〕 劉秀芬：〈誰識傷心鄭都官，蒼蒼煙雨遍江離——試論晚唐巨擘鄭谷及其詩歌〉，河南《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1月，

鄭谷執著於儒家精神，對社會具備責任感，其作品對災難體驗深刻，老愁窮困中亦不曾改變。

大凡文學藝術之作，均有其創作「動機」，所謂「動機」(Motive)或「驅力」(Drive)，係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該種活動，並導使該種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行的一種內在的歷程。^{〔註17〕}此種「內在歷程」可以藉此觀察詩人何以要創作諷刺詩篇？若自細部再探究，應該還有其他的創作要素相輔，如法國學者泰納(Taine)在其《英國文學史》中標出種族、時代、環境三大要素來解釋一切文藝作品。而朱光潛則主張三大要素之外，作者的「個性」也不可一概抹煞。^{〔註18〕}因為同樣題材的諷刺詩，不同的作者依其個性，詮釋的角度不同，所呈現的主題也就不盡相同了。

所謂諷刺詩，主要是指以現實社會為主題的寫實詩歌，包含關懷民瘼與諷刺時事之作。晚唐五代詩人，不論被歸屬於那個詩風、派別，多少都會有一些諷刺之作。畢竟國勢動亂如此，即使想逃避現實，也不可能完全無感於心。時代風氣之影響，社會習俗之移人，沛然難禦。劉勰〈時序篇〉云：「歌謠文理，與時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也。」時代社會影響文風，往往會產生集體之風格。他在〈時序〉論建安文學：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

第37卷第一期，頁132。

〔註17〕張春興、楊國樞：《心理學》，台北：三民書局，1970年9月，頁120。

〔註18〕朱光潛：《文藝心理學》，見《朱光潛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卷1，頁405。

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註19〕

此論建安時期，由於曹氏父子雅好詩賦，故文風鼎盛，正所謂「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也。」當時文士多具激昂悲歎之風，實緣久遭離亂之苦，風俗衰微，人心哀怨，作家往往志思蓄憤而筆致深長，故作品慷慨而多意氣。時代社會左右文風，此為明證。

時代的主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文學的主題。唐末五代的作家，所銘心刻骨的，就在於軍閥混戰而造成的種種不幸和災難，以及他們在戰火紛飛中，輾轉流徙的切膚之痛，因而戰亂和流離，就必然地成為當時作家普遍關注的現實問題。諸如皮日休、陸龜蒙、杜荀鶴、羅隱、聶夷中、于濇等詩人。

本文有關主題取向分類標準乃以「詩題」為主要分類依據，輔以詩歌內容，以釐清重疊性過高之詩，例如：杜荀鶴〈山中寡婦〉，依詩題看既屬生民疾苦又是統治者肆意剝削之作，其內容主要從兵役、賦稅、無衣無食三個生活側面，詳盡描述了山中寡婦的悲慘遭遇，深刻揭露了晚唐百姓貧苦的根源，故列入哀憐生民疾苦一類。又如：羅隱〈感弄猴人賜朱紱〉，依詩題看既是統治者昏庸無能，又是吏治問題之詩，觀其內容，是對於最高統治者表明批判的態度，則列入批判昏庸統治者一類。必須附帶提出，由於古典詩歌是一種濃度極高的文學作品，同時具多義性，在詩歌主題取向之分類上，自有其困難度與侷限性，因此本文的歸納分類標準並非絕對，但就呈現唐末五代諷刺詩主題而言，相信是最恰當的方式。

第一節 批判昏庸統治者

唐末五代朝政十分腐敗，首先具體呈現在最高統治者的腐敗昏聩上。帝王們除了生活上的荒淫放縱，政治上亦復昏庸糊塗。在王綱解

〔註19〕劉勰：《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71年5月台9版，卷9，頁24。

紐期間，在國家社會混亂殘破之時，也正是處士橫議，百家爭鳴之日。而唐末五代，面對著一個輝煌王朝行將結束，社會人民所面對的是整個時代的動亂殘破、疏離與傷痛，昔日強大的唐王朝，已因無法平息混亂與危機而苟延殘喘。各種弊端、矛盾叢生，統治者的昏庸無能，荒淫奢侈，實難辭其咎。

對於君王昏庸無能，荒淫奢侈以至於失政敗德的批判，是唐末五代諷刺詩中頗為特殊的議題，為歷代所僅見。此乃肇因於唐代的史學思想已由西漢以來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轉移至統治階級負有國家興亡盛衰之權責的歷史觀念；〔註20〕就統治者本身而言，也有借鑑於史事，以作為施政參考之傳統。

唐末共經歷了懿、僖、昭、哀等帝王，但專制統治者，對於問題層出不窮的國家社會，以及許多一觸即發的矛盾與衝突，身為最高統治者，卻無法發揮任何作為與影響，這雖然與唐代後期宦官專擅，把持朝政有關，但唐末君主本身的昏庸無能、荒淫奢侈，亦屬罕見。如懿宗在位十四年，因佞佛而怠政，甚至「削軍賦而飾伽藍，困民才而修淨業」〔註21〕懿宗剝奪民財以建造佛寺，並於咸通十四年迎佛骨入京，其奢靡之程度，尤甚於元和年間迎佛骨的憲宗，而且又遊宴無節，習於淫靡，為了揮霍，導致賦斂過度。懿宗之後是僖宗，即位時年方十二，政事完全委由奸宦田令孜，皇帝終日嬉戲。於是唐末五代詩人們，徹底擺脫儒家傳統的君臣之道，衝破了相沿成習批評貪官污吏，而不抨擊皇帝的戒律，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帝國最高的統治者。或直接抨擊統治者的昏庸，所導致的社會荒亂；或認為統治者應對政治、社會的動盪不安擔負政治責任。詩人乃借助於史事，以諷今或直刺當朝君主。

唐末五代文人敏感而脆弱，被「山雨欲來風滿樓」〔註22〕的

〔註20〕 潘志宏：《晚唐三家詠史詩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第二章第三節。

〔註21〕 劉昫等編：《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92年，卷19，〈懿宗紀〉頁117。

〔註22〕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7月，許渾〈咸

末日臨近感所籠罩。詩人們在感歎歷史興衰的同時，借歷代的昏君奸佞，以抒發對當朝統治者的諷刺。詩人們已不再奢望李唐會再出現聖君，反倒有可能是陳後主、隋煬帝之類亡國之君，擔心當今皇帝步其後塵。因此，唐末五代詩人諷刺的矛頭，首先指向了最高統治者的荒淫誤國。以下分別就批判國君昏庸無能荒淫奢侈、不惜民力肆意剝削、對君王責任的要求等方面加以分析。

一、昏庸無能荒淫奢侈

唐末五代的詩人，處於衰世末期，往往從歷史上朝代興亡的法則中，借古以諷今，希望提醒當朝統治者，能夠從前朝的淪亡中汲取教訓，唐末五代詩人，思考歷代歷朝興亡更替的法則，表現於詩作之中，是對歷史上亡國之君的檢討。這些詩作中，詩人所吟詠多為南朝、隋朝，這些歷史上的短命王朝，一則距離唐代不遠，其次，這些王朝都是由國君昏庸無能荒淫奢侈，而導致失敗。

皮日休對君王只顧賞玩，沉緬於酒色，卻不管百姓死活，多所抨擊，有〈哀隴民〉、〈館娃宮懷古〉及〈館娃宮懷古〉五言絕句五首等，其〈館娃宮懷古〉五絕第一首云：

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

越王大有堪羞處，祇把西施賺得吳。（《全唐詩》卷 615）

館娃宮以西施得名，是春秋時期吳王夫差建造的宮殿，難道吳、越的興亡真就是由西施一個女子來決定的麼？顯然不是。詩人故意運用指桑罵槐的曲筆。

陸龜蒙抨擊國君昏庸，被朝中讒邪小人矇蔽，其〈雜諷〉之四（《全唐詩》卷 619），詩人痛恨小人如豺狼般，巧弄簧舌，製造是非，其利口難以防堵，「非是既相參，重瞳亦為瞽。」無怪乎國君被其矇蔽了。在〈感事〉（《全唐詩》卷 619）中再次為小人讒言殺人，設計陷害忠良的卑劣行徑提出諫言：「君聞悅耳音，盡日聽不足。初因起毫

髮，漸可離骨肉。」復對國君聽信讒言的昏庸，感慨不已。其〈鶴媒歌〉有：「而況世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的警語，而〈離騷〉更是感歎深重：

天問復招魂，無因徹帝閭。

豈知千麗句，不敵一讒言。（《全唐詩》卷 627）

「天問復招魂，無因徹帝閭。」昏庸的君王，小人的讒言，詩人不禁感慨，縱使屈原復生又奈何。

另一詩人羅隱，其詩歌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對最高統治者，加以嘲諷和批判，羅隱〈江南〉詩云：

玉樹歌聲澤國春，纍纍輜重憶亡陳。

垂衣端拱渾閒事，忍把江山乞與人。（《全唐詩》卷 665）

羅隱對於陳後主好色昏瞶以及荒嬉奢靡作直切的諷刺，在今昔對比的景物中，不斷地提出為什麼就這樣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讓人呢？

安史之亂，羅隱認為應歸罪於明皇，這在當時，確屬高人一籌之見解，其〈華清宮〉詩云：

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

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全唐詩》卷 664）

羅隱在「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二句，諷刺玄宗的不知振作，好色誤國，語氣甚為尖銳。其另一首〈帝幸蜀〉詩曰：

馬嵬山色翠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

泉下阿蠻應有語，這迴休更怨楊妃。（《全唐詩》卷 664）

羅隱記述其事，諷刺唐皇的治國無方，不能怨怪他人，貴妃更是非戰之罪。可見羅隱在質疑「女色禍水」的傳統觀點。

羅隱從現實生活事件中，敢於對最高統治者表明批判的態度，其〈感弄猴人賜朱紱〉詩云：

十二三年就試期，五湖煙月奈相違。

何如買取胡孫弄，一笑君王便著緋。（《全唐詩》卷 665）

在國家殘破、民不聊生的時候，唐僖宗竟然因為喜愛一隻馴善，能跟朝臣們一起上班的猴子，而賜給玩猴伎人一件五品緋袍。